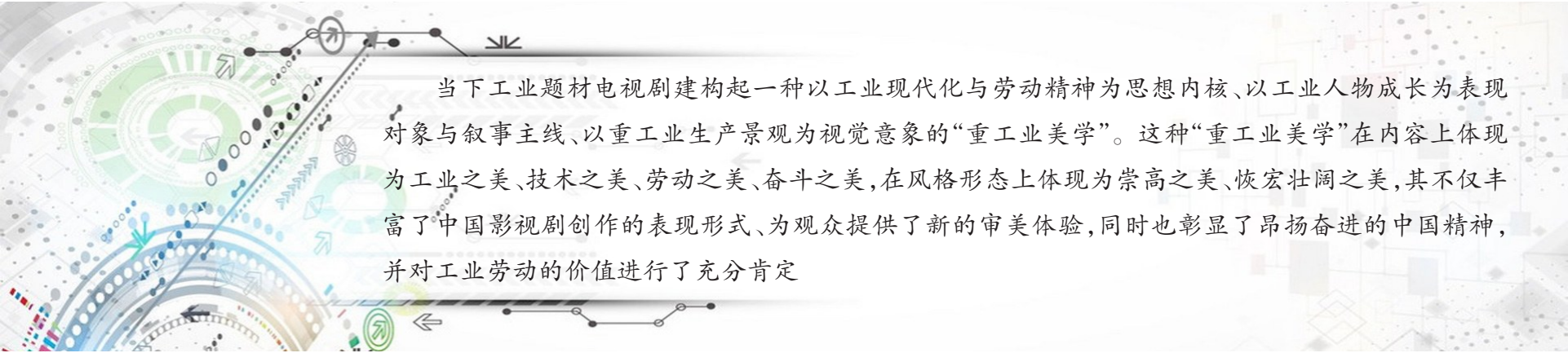


中国式工业现代化的影像史诗

——当下工业题材电视剧创作趋向观察

□王翠艳



当下工业题材电视剧建构起一种以工业现代化与劳动精神为思想内核、以工业人物成长为表现对象与叙事主线、以重工业生产景观为视觉意象的“重工业美学”。这种“重工业美学”在内容上体现为工业之美、技术之美、劳动之美、奋斗之美,在风格形态上体现为崇高之美、恢宏壮阔之美,其不仅丰富了中国影视剧创作的表现形式、为观众提供了新的审美体验,同时也彰显了昂扬奋进的中国精神,并对工业劳动的价值进行了充分肯定

近日,改编自阿耐小说《艰难的制造》的电视剧《淬火年代》于央视一套收官。剧中柳钧的故事虽已落幕,但属于中国制造的故事却在一代代人手中续写。如何用影像的方式讲好中国式工业现代化的故事?该剧的热播带来些许启示。近年来,呼应“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的时代精神,工业题材电视剧创作出现勃兴局面。2018年至2025年间,涌现了诸如《大江大河》《奔腾年代》《美好的日子》《麓山之歌》等数十部作品,涵盖石油、化工、钢铁、航天、核电、重卡、高铁、工程机械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它们以厚重的历史理性与充沛的艺术感性,书写了一部多元交响的中国式工业现代化影像史诗。

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多维再现

近年工业题材电视剧创作者往往通过历史回望的宏观视角,将个人发展纳入时代洪流予以观照,继而通过个人命运的变迁凸显工业现代化发展进程。这使得较长的时间跨度、较高的历史容量以及相应的史诗品格,成为近年工业题材电视剧的突出特征。

以讲述中国机车制造故事的三部作品为例:《铁马豪情的日子》表现了长辛店铁路工人从1917年受苦难遭到1958年满怀豪情完成机车制造的40年历史,而2017年时速350公里的高铁上一对母子的对话则将这一历史延长到了一百年;《美好的日子》从战斗英雄齐向前转型为机车工人讲起,从1950年代一直讲到2020年代的复兴号高铁;而《奔腾年代》则借助1960年留学归国的技术员常汉卿与女火车司机金灿烂的故事,串连起中国机车20余年的发展历史。此外,讲述三代人航天梦想的《逐梦蓝天》从1949年的开国大典讲到2019年,聚焦“大三线”故事的《大江年华》的叙事时段从1960年代中期一直讲到改革开放;而《大江大河》《沸腾人生》《淬火年代》则从改革开放初期讲到当下。这些承载历史回望使命的年代剧作,与表现当下“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的《麓山之歌》《最好的时代》《奋进的旋律》《淬火年代》等工业题材剧一起,不仅串连起中国工业现代化的百年历程,更覆盖了从基础工业到高端制造的广阔领域,从纵横两个维度承担起以影像方式为中国式工业现代化写史的艺术使命。

与早期工业剧多围绕企业家或普通工人展开叙事,淡化技术环节不同,这些作品更倾向以技术工人或工程师为叙事核心,并围绕技术难题的破解展开戏剧冲突,呈现出清晰的行业特征。《大江大河》中的宋运辉、《麓山之歌》中的卫丞、《火红年华》中的夏方舟与秦晓丹、《沸腾人生》中的沈夏、《奔腾年代》中的常汉卿、《淬火年代》中的耿云辉、《奋进的旋律》中的林杰、《淬火年代》中的柳钧均为技术专业人才,同时也是影片叙事的中心。他们身上所凝聚的家国情怀、自主创新的科学理性与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构成了工业题材电视剧的价值内涵,也为观众展示了工业之美、科技之美和劳动之美。

专家研讨电影《好好说再见》

本报讯 8月3日,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和浙江省影协主办的电影《好好说再见》专家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该片由陈三俊担任总制片人,张弛、王崑琳执导,以“安宁疗护”为主题,用温暖治愈的笔触,讲述了身患绝症的单亲妈妈应诺在女儿丢丢与父亲应大海的陪伴下,从容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故事。该片荣获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优选观众喜爱影片”与第12届浙江电影“凤凰奖”优秀中小成本故事片、优秀男配角两项荣誉。

与会专家认为,《好好说再见》是一部聚焦现实情感的影片,通过“好好告别”这一仪式感叙事,把生命教育转化为温暖流动的影像诗篇,触达了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在创作上展现出独特的艺术追求。电影直面“临终关怀”这一重要却常被回避的社会与生命议题,通过温和而坚定的姿态引导观众思考生命的尊严、爱的责任以及告别的意义,以极大的同理心和人文关怀,触动了人性最柔软的深处,传递了积极生命观和向善的力量。该片继承了中国电影“哀而不伤”的美学传统,在人生的哲思中完成精神升华,为构建中国电影多样化生态提供了生动注脚。

(许莹)



赋予工业劳动以诗意和浪漫

宏大叙事与史诗品格赋予工业题材电视剧厚重的思想内涵与沉稳的现实主义风范,同时也使其承载着鲜明的价值导向,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概念化、说教化的窠臼。行业技术特征虽然使其别具工业之美与技术之美,但也与电视剧艺术的生活化与情感化之间产生天然矛盾。令人欣慰的是,近年工业题材电视剧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叙事与视听语言方面呈现出对电视剧艺术规律的充分尊重,最终以丰沛的感性魅力解决了上述问题。

首先,大多数工业题材电视剧采用以成长型主人公为核心的群像叙事手法,构建起更具真实质感的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大江大河》中的宋运辉、雷东宝、杨巡、水书记、刘总工、《麓山之歌》中的卫丞、董孟实、方锐舟、《沸腾人生》中的艾长安、徐驰、《淬火年代》中的柳钧、钱宏明、柳石堂……最初均属于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的正面人物形象,但同时都有人性的弱点。他们或在克服自己人性弱点的过程中成长为“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脊梁式人物,或者蜕化为挑战规则的利己主义者。作品将主人公的成长置

于自然环境艰险、技术失误、爱情遇挫、同行竞争、政策变革等多维环境中,使主人公通过顽强拼搏与刻苦钻研获得成长的历程不仅更具普遍意义,同时,也让支撑其成长的理想与信仰力量更能获得观众共情。

其次,在情节叙事方面,这些作品在将工业故事转化为戏剧情节、以科研技术攻关作为叙事核心、承载深广的社会生活内涵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其一,创作者善于将工业故事置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展开,使工业故事不只是单纯的“工厂故事”,而具有了“工业发展史”的意义。《火红年华》以“三线建设”为主线,同时穿插了武本奇的创业副线,暗示了民营经济崛起对国营企业的影响。与此类似的,还有《大江大河》中宋运辉(国营企业)、雷东宝(乡镇集体企业)、杨巡(个体经济)三条线索并置以及《大博弈》《淬火年代》《麓山之歌》《沸腾人生》等剧对于技—工—贸路线和贸—工—技路线的不同抉择。这一叙事智慧有力地揭示了工业发展并非封闭的系统,而是与国际环境、国家政策、市场规律、民生需求互动的开放体系的客观事实。其二,创作者普遍采用了家国同构的叙事策略,除去将个人生活线与事业发展线紧密交织外,还将主人公的个人发展与国家在某一工业领域的攻

坚克难深度关联。如此一来,主人公的事业轨迹也就与国家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个人记忆成为国家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最后,当下工业题材电视剧作品普遍注重对工业景观的视听呈现,具有将劳动场景审美化、诗意化的自觉意识。气势恢宏的现代化厂房与精密仪器的冷光,铁水奔流、火花飞溅、高铁奔驰、飞机翱翔、重型装备的壮阔风姿,传达出现代工业令人震撼的视觉美。在此基础上,作品充分注意对劳动场景的仪式化呈现。作品中反映劳动场景的长镜头与慢镜头,赋予工业劳动以诗意和浪漫。这种视听呈现方式不仅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使观众能够充分领略工业剧独有的力量之美。

创作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

借助厚重的历史理性与充沛的艺术感性,当下工业题材电视剧已经成功建构起一种以工业现代化与劳动精神为思想内核、以工业人物成长为表现对象与叙事主线、以重工业生产景观为视觉意象的“重工业美学”。这种“重工业美学”在内容上体现为工业之美、技术之美、劳动之美、奋斗之美,在风格形态上体现为崇高之美、恢宏壮阔之美,其不仅丰富了中国影视剧创作的表现形式、为观众提供了新的审美体验,同时也彰显了昂扬奋进的中国精神,并对工业劳动的价值进行了充分肯定。

在成功建构起“重工业美学”的同时,当下工业题材电视剧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题材领域局限于传统重工业领域,对于轻工业、生物信息技术、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新业态缺乏关照;人物形象侧重技术型、管理型人才,缺乏对广大普通工人、新业态劳动者形象的精心刻画;在主题与人性开掘上理想主义成分过重、冷峻分析不足。未来工业题材电视剧应在针对性克服既有不足的基础上,积极吸收文学、戏剧、电影等“长叙事”艺术的优良,开辟新的生存空间。比如,收视表现较好的《大江大河》系列、《大博弈》《淬火年代》《麓山之歌》均改编自文学作品,文学底本为电视剧提供了繁复的生活容量、深刻的主题思想、立体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叙事策略;而在视听语言运用上,这些电视剧的构图、景别、镜头调度等也具有鲜明的电影感,这些都不失为工业题材电视剧构建差异化特色、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路径。

总之,工业题材电视剧不仅是反映中国式工业现代化历程的审美镜像,同时也是文艺工作者建构、诠释、传播家国情怀、创新意识与工匠精神的文化实践。这些作品彰显的“信仰之美”与“崇高之美”,也必将凝聚起“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精神力量,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院长,工会与劳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其主持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师学术创新团队项目“职工文化与劳动传播研究”(项目号24JSTD003)的阶段性成果]

电影《天宝》根据藏族红军战士天宝的人生经历创作。影片兼具人物传记、战争历史、民族题材等多重属性,是一部饱含红色基因的革命历史影片,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该片的艺术特点首先表现在题材内容的拓展和深入挖掘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漫长岁月里,有无数英烈前辈、英雄豪杰为之奋斗,付出了生命。他们中的很多人名留青史,被记录在共和国的历史档案中。长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多聚焦于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虽然佳作频出,但随着时间推移,部分作品因内容雷同、风格接近而缺乏新意,难以引起观众共鸣。如何在革命历史题材中实现突破,找到与当代观众的连接点,是这类影片亟待解决的课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把目光投向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不曾留下特别伟大的英雄事迹,但正是这些如历史长河中水滴沙粒般的普通人,用平凡铸就了伟大。这种创作视角的转变,既丰富了革命历史叙事,也为此类题材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天宝就是革命队伍里千千万万个战士中的普通一员。影片以第一人称的主观视角记述了他投身革命,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经历。相对于以往常见的重大历史和英雄颂歌,天宝的故事显得有些平凡。但是影片通过他的个人记忆,又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紧密相连。像三过草地、激战百丈关、卓克基会议和《告康藏西番民众书》、延安抗大的民族班等。这些事件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和影响,直到今天才被人们充分认识。天宝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红军战士,他不可能了解中央上层的决策过程。他记下的只是三过草地的经历。为什么马上要走出草地了,却要原路返回?为什么还要一次又一次地踏入草地?这种以小见大,从个体记忆出发来展现宏大历史的叙事方式,是当下革命历史题材的一个新视角。

其次是抓住人物的独特性,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无论什么时候,人物都是电影的灵魂,从一部宏大的历史长卷中凸显出个人魅力,让人物去征服观众是创作的关键。天宝既是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又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他的人生之路充满传奇,从一个寺庙的小扎巴到红军战士,再到共产党的干部。这条路是属于天宝个人的,也是与别的红军战士不同的。唯有抓住这独特的一个,才能让人活起来,赋予影片艺术感染力。

作为藏族人,天宝和他的前辈一样,毕生心愿就是去布达拉宫朝拜。然而,他的虔诚并没有换来期待中的神灵庇佑。相反,他的小弟弟被卖掉,母亲哭瞎了双眼。如果不是遇到红军,天宝自己也可能殒命在朝圣路上,红军救了他的命,他慢慢地了解红军,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在革命队伍里,他得到战友的关爱,领导的呵护。其中,张连长是兄长,又是他的引路人,从天宝参军直到他的成长,张连长都在默默地支持、帮助他,在战场上为救天宝负伤。

与此同时,影片也表现了红军宁肯自己饿肚子,也不动藏族群众的粮食的情景。这些都是天宝亲眼所见的。所以他坚信“红军把穷人和藏族人当兄弟”,也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

该片的第三个特点是用丰富生动的情节、细节讲述故事。该片虽然是严肃主题却充满情趣,在平实的叙事中,挖掘生活本身的戏剧性。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天宝与毛主席的三次见面。第一次是天宝给红军带路,途中给“首长”送糌粑,那时他并不认识毛主席,只是单纯地给红军首长送吃的。第二次是在延安,天宝(当时还叫桑吉悦希)担任民族班的班长,毛主席给他起了汉文名字,从“物华天宝”中取两字,桑吉从此成了天宝。第三次是在北京,西藏和平解放了,毛主席派天宝回西藏工作,对他寄予厚望。天宝也理解了毛主席当年在延安说的“解放了西藏怎么办”的意思,为祖国的民族事业奋斗一生。影片通过毛主席与天宝的关系表现了领袖与普通战士的关系。

《天宝》在影像美学和音乐创作上同样独具匠心,主创团队对当地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呈现恰到好处,使整部影片兼具艺术深度与观赏价值。

(作者系原八一电影制片厂研究室主任、军事影视评论家)

个体记忆里的宏大历史

——观影片《天宝》

□张东



展现古老乐器的独特魅力

本报讯 7月27日,中央民族歌舞团《艺彩华韵》青年艺术人才实践剧场——“独一无二”雷莹独奏琴音乐之旅(贰)在北京老舍剧场上演。中央民族歌舞团独奏琴演奏家雷莹与多位艺术家联袂献艺,呈现了国家级非遗项目京族独弦琴艺术与现代多元音乐的深度交融,展现了古老乐器独弦琴的独特魅力。

作为雷莹时隔十年后再度举办的一场沉浸式音乐会,此次音乐会包含13首曲目,其中既有传统京族小调、国际大师的经典之作,又有影视金曲的改编旋律、民乐与电子音乐的潮流混搭,不仅以丰富的表现形式集中展示了雷莹的艺术成就,也体现了青年一代艺术家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探索与创新实践,让独弦琴这件曾濒临失传的非遗乐器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

雷莹表示,此次音乐会演奏的每一首曲目中都注入了自己这十年来对音乐的理解和人生的感悟。“独弦琴源于京族但不止于京族,我希望用这件独特的泛音乐器演绎出更多风格的音乐,让不同观众都能找到心灵共振的瞬间,在音乐之旅中收获独一无二的艺术感受。”

(王 竟)